

# 归有光古文非唐宋派论

## ——兼论归有光古文创作特征

张荣刚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古文流派,其为文观点以宗尚唐宋古文为显著特征。归有光是明代古文大家,在持论方面与“秦汉派”龃龉不合。一般认为归有光在自唐宋至清代的古文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承唐宋八大家而下开清代桐城派,因此文学史上一般将其归入唐宋派之中。然而,通过对归有光古文宗尚、创作特征等的分析,可知将其归入于古文中的唐宋派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关键词:**归有光;唐宋派;古文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16.03.009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6)03-0042-05

归有光生于明代正德元年,卒于隆庆五年,他生活的时代是明代古文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之初,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秦汉古文于前;这个时期之末,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遥相呼应而崛起于后;而唐宋派中的王慎中、唐顺之等,又振起于前后七子之间。归有光在嘉靖前期渐露头角,针对当时宗尚秦汉古文所产生的流弊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尤其是与后七子中王世贞龃龉不合而力加诋排,故论明代古文发展史者,一般将归氏置于王、唐等古文中的唐宋派之列,如袁行霈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和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等著作。对于归有光与唐宋派的关系,章培恒、骆玉明所著《中国文学史》虽然指出了归有光与王、唐的不同之处,然而并未指出归有光古文与唐宋派的区别。因此,本文将以归有光为文宗尚、古文特征等为研究对象,尝试揭示归有光在古文上并不属于唐宋派。

### 一、归有光为文宗尚与持论

明代嘉靖时期,秦汉派、唐宋派之势此消彼长,故当时文弊不外乎二派末流之弊。前后七子所重在

辞而以字词、句式学秦汉,其弊在于摹拟、冗沓与剽窃;王慎中、唐顺之诸人所重在理而以义法学欧、曾,义易流于陈言与浮腐,法易导致冗长与拖沓。换句话说,秦汉派摹拟秦汉古文的字句,唐宋派摹拟唐宋古文的文法和义理。而归有光在古文创作上对秦汉、唐宋二派皆有不满,归氏尝自言:“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sup>[1]869</sup>“琢句为工”者,即摹拟、冗沓秦汉古文的七子派,归氏此处所不满的是古文中的秦汉派。归有光又道:“平生不能为八代间语,非时所好也。”<sup>[1]870</sup>所谓“八代间语”,与上文所言“齐、梁之余”的意思相同,主要批评的是秦汉派的宠饰辞藻弊端,然而排比对偶骈体之文,亦是齐、梁等八代之文的特征,唐代古文虽然力排骈体,但是并未完全摆脱行文结构上的排比整齐,如韩愈为文甚而有意于裁对整齐;欧、曾为文不排斥骈体,既是宋代古文的特征,又是宋代古文运动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而王慎中、唐顺之为文正是以欧、曾为宗尚,故归有光虽未明确反对王慎中、唐顺之,而三人为文旨趣不同亦是客观存在的,归氏有云:“余

收稿日期:2015-09-16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学院博士项目“明代取士经义文体流变研究”(项目编号:14BS001)

作者简介:张荣刚(1978—),男,河南南阳人,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与古代散文流派。

好古文辞，然不与世之为古文者合。”<sup>[1]221</sup>说的就是为文不与秦汉、唐宋二派同趣之意。

那么，归有光为文宗尚是什么呢？归有光尝谓：“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sup>[1]426</sup>又谓：“余少好是书，以为自班孟坚已不能尽知之矣。”<sup>[1]388</sup>故归氏为文之所学，有得《史记》之神于千百年后之说。今考归有光所评点《史记》，大要在于分析《史记》的文法，其独断之处亦有前人所未言者，归氏尝自言：“天官、封禅、河渠、平准书奉去，子长大手笔，多于黄圈识之。”<sup>[1]864</sup>归有光此处所言司马迁大手笔之处，指的是什么呢？据清代王拯所言：“《史记》起头处来得勇猛者圈，缓些者点；然须见得不得不圈、不得不点处乃得。黄圈点者人难晓，硃圈点者人易晓。硃圈点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亦有转折处用黄圈而事乃聊下去者。墨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硃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sup>[2]</sup>又言：“大概黄笔蓝笔，文之脉络提顿关锁。”<sup>[2]</sup>是故，司马迁的大手笔，在归有光看来乃是行文气脉所在，或为提顿或谓关锁<sup>①</sup>。

归有光为文所学以《史记》为宗尚，而对于自己所作之文，亦常常与《史记》《汉书》相比拟。归氏尝与友人书，道：“惟《记事》一首，乃仆自以为必可传者。少好《史》、《汉》，未尝遇可以发吾意者。独此女差强人意，又耳闻目见，据而书之，稍得其实。但世人知文者绝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后耳。”<sup>[1]144</sup>又道：“再奉《记事》一首，前所述颇踈略，当以此为证。此皆得之众论，无一语妆饰，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sup>[1]146</sup>此处所言的《记事》，即《书张贞女死事》一文，此作是归有光以《史记》为法而所作之文，且其反复修改，自谓得司马迁史法。张贞女一事，在归氏看来可谓一绝好题目，故而围绕张贞女所作文多至六篇，既记其死事，又记其狱事，复祭其灵、招其魂、述其神异、辨其贞烈，认为必传于千百世之后，而有欲与《史记》《汉书》同不朽之意。

此外，《陶节妇传》，亦是归有光以《史记》为法而所作之文。归有光在《与徐子检》中云：“昨为《节妇传》，送陶氏。李习之自谓不在孟坚、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书者入石，可摹百本送连城，使海内知有此奇节，亦知有此文也。”<sup>[1]870</sup>与沈敬甫则又云：“班孟坚云‘太史公质而不俚’，人亦易晓。柳子厚称‘马迁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节妇传》，懋俭甚聪明，并可与观之。”<sup>[1]863</sup>此文之作，归有光俨然有超班

固而上之的意思，且以得史公之“峻”而自任。至于其所作《南京车驾司外郎张君墓志铭》，归有光则又云：“《张驾部墓志》已寻得，‘深纯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试诵此言，当否？”<sup>[1]867</sup>此处则又以“深纯雅健”拟史公。

通过以上所论可知，归有光为文所学，是以《史记》为效法学习的对象。至其具体所为，既不为秦汉派的摹拟、短钉，亦不为唐宋派专注于唐宋古文结构与文法，而是求文法于秦汉古文之中。故其所评点《史记》，所重者在文章的关锁与气脉而非字词语式。由是而言，归有光在为文方法上，是折衷了秦汉派与唐宋派的观点，秦汉派认为古文之法死于宋，而其所学秦汉古文者又在于字句的高古；唐宋派认为秦汉古文法密而不可窥，而唐宋古文之法亦源于秦汉古文，遂于唐宋古文之中求文法。归有光之学，则是直接求文法于《史记》之中，事实上就是以唐宋派学文之法而学于《史记》。就归有光对自己作品的看法而言，亦自信自喜于《史记》《汉书》的特征，对于其刻意以《史记》为效法对象而所作的张贞女等文，甚而以必传于后世期许。因此，就为文所学与持论而言，将归有光置于王、唐之列而谓之唐宋派，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 二、归有光古文特征分析

归有光所作之文，其认为必传者而后人未必欣赏，其无意而为之者却正是后人所欣赏者。事实上，归有光古文的特征并非如其所言者，就其所自期许与后世所称赏的作品而言，如《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项脊轩记》<sup>②</sup>以及《先妣事略》等文，均是《震川先生集》中可以代表归有光古文创作特征的篇章。

《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皆为归有光所自负之文，而谓其必传于后世者。二文皆以记事为主，而其叙事拖沓、冗长的弊端，尽见于文中。《书张贞女死事》一文，主要人物为张贞女、汪姬以及胡岩，其中张贞女又为主要人物中的主要者，而归有光的叙述，常有主次颠倒之弊，如文中“遂入，与姬曰”之语，为其语焉不详之处；“姬尝令贞女织帨”数语，为其叙事无法之处。《张贞女狱事》一文，所叙更加凌乱，读之殊无生气，似乎徒为事情史料的堆砌；其中叙张、邱二人事，即归有光认为“但伤讪直，不便于眼前人”<sup>[1]869</sup>之事，故其叙事常在半吞半吐之间，使人不易明白。归有光以此事此文为必传者，故后世评点此文者，则竞相附会其说，如清代董说即以“述事

不漫不躁”<sup>[3]127</sup>称之。事实上,归有光作《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以叙家庭琐事之笔法叙事,就张贞女死事狱事而言,有使人怒发冲冠之处,亦有令人扼腕叹息之处,而叙事皆“不漫不躁”如拉家常,此正王夫之所谓“陋措大不知好恶”<sup>[4]</sup>者。就文法而言,如《张贞女狱事》开篇以“初,胡岩……”语开头,与《书张贞女死事》一文相连,归有光亦有“《书张贞女死事》当附《死事》之后”<sup>[1]868</sup>云云,此一文法特征,在归有光其它篇中亦存在,单独读其一文,常有不知所云之感。究其原因,即在于模拟《史记》文法。

《项脊轩记》是归有光记家庭琐事、言骨肉亲情之作。该文共 630 字,作于嘉靖十四年,是时归有光 30 岁,虽未有功名,然其古文已小有声名,与俞允文诗、张自新制义有“昆山三绝”<sup>[5]</sup>之誉。此篇之所以为佳作,在于叙事、议论皆在数百字之内办之,而景与情又贯穿其中,实短小而味隽永。此文最可注意者,乃在于“余既以此为志”以下部分。清代王拯对归有光为文之法甚有心得,对于此文尝谓:

它日,友人有以此文示余者,曰:“读是久,有不可解者。”视之,乃文中“余既为此志”句,余曰:“此文后跋语耳,而著录者误与文一。”友人未之信也。按文“余既为此志”后百十四字,历叙作文以后十余年事,语尤凄怆动人,与文境适相类,人但赏其文,刻本联属之,因熙甫句中变“记”字为“志”,稍异。其实,“志”、“记”义本通,而遂不察,其为后跋语耳。文自首至“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句,记轩中之景物。自“庭中通南北为一”至“为篱为墙凡变”句,记轩之沿革。自“家有老嫗”至“瞻顾遗迹,如昨日事,令人长号不自禁”云云,记轩中遗事。其后又足以“轩前故尝为厨”及“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数言,乃记轩毕矣。“项脊生曰”下,“余既为此志”句上,则文之后论,例如志之有铭,传之赞而骚之乱也……夫熙甫之文,流传至数百年,其中为人所最赏叹如此《记》者,而其著录舛谬若此,而人多忽之。<sup>[6]</sup>

“余既以此为志”以下结构,王氏论之甚详,今人则谓归有光摹拟《史记·田单列传》而称之为“似奇而实正”<sup>[7]</sup>。《史记·田单列传》中“太史公曰”后复记“君王后”及“王蠋”二事,前者补襄王之事,襄王于传主田单为君,故于文后始补言之;王蠋事与田单毫不相关,故载于传中不妥,然与士气攸关,且亦是太史好义使然,故特于文后表彰而出。归氏《项脊轩

记》,以项脊轩而志亲情之哀感,随情而发随心而抒,皆絮絮道来而情意凄凄。“项脊生曰”以后之事,乃数年后复览此志之感。归有光为文有用“归有光曰”“项脊生曰”“归子曰”等议论缴结文章的特征,论者认为是归有光学《史记》之处。归有光为文所学固在于《史记》,然而岂有以数十年之精心构思来摹太史公?且与模拟字句者又有何异?事实上,“太史公曰”的体例,实始于《左传》中之“君子曰”,司马迁依左氏而创为定式,遂成后世史书一体例,甚而唐代传奇及古文家为人作传,亦仿此例。

《先妣事略》一文,与《项脊轩记》同一机轴,论者多谓归氏之所以能上承唐宋八家者,即在于此类文章,如姚鼐谓其“直接韩欧”<sup>[8]</sup>。事实上,归有光此类文章之所以为佳,主要还在不空洞而读之亲切有味。此文共 577 字,自“先妣周孺人”至“以二子肖母也”,记周孺人初嫁归氏至卒时之事略;自“孺人讳桂”至“皆不忍有后言”,记周孺人未嫁及既嫁一二治家之事;自“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至“乃喜”,记归有光与其母周孺人之一二事;自“孺人卒”至“惟外祖与二舅存”,记周家人卒之事;自“孺人死十一年”至“痛哉”,记归有光追忆周孺人之事。此文所记周孺人事略,主要以时间线索贯穿始终,而所叙之事前后跨度十年,或记吴家桥之事,或记归家之事,正如陈维崧所言“零零星星,断断续续”<sup>[3]157</sup>的特征。此文中最妙处,乃在于文中“伤哉”“皆喜”“乃喜”“痛哉”等数语,此实为归氏学太史公之处,使文章抑扬起伏,气脉馀纤中有跌宕之致,而哀痛之思亦跃出于字里行间之外。然而此文不足之处,在于行文稍显拖沓拉杂,如记周家三十人死于羊狗之痾,虽可表达归氏外家门户零落之悲,然周孺人并非死于羊狗病,故本不须赘语如此。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归有光学《史记》之所得,其以《史记》为法而谓之必传于后世的《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等文,并非为人津津乐道;而足以代表归文成就者,则为《项脊轩记》《先妣事略》等记事抒情之作。林纾尝谓:“熙甫文长于述旧,以能举琐细之事为长,似学《史记》、《汉书》之《外戚传》。故叙家庭琐细之事,颇款款有情致。”<sup>[9]</sup>以笔者之意,谓归有光为文之得于《史记·外戚传》,盖就其题材而言。《外戚传》所记之事,亦为家人骨肉之事,事虽琐碎,而正显示其情之真挚而绵密。然而太史公所长并非仅仅见之于《外戚传》,故而归氏于太史公为文之法并未达其深处。究其原因,则在于气不

足，气不足则无百转流动之势。史公乃豪杰之士，而归则满肚皮牢骚之语，故其情非得已之心，流连于骨肉、朋友之情。黄宗羲尝谓：“震川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sup>[10]</sup>由是而言，黄氏亦是以“一往情深”之心而许之。

影响归有光古文特征者，除了在文章题材方面学《史记·外戚传》而善于记家庭琐事、言骨肉亲情之外，科举之习亦影响归有光古文的创作。归有光为人所作之序，其集以人命者，叙人之生平，以号、斋、轩等命名者，即以号、斋、轩等引申而论之，实皆八股讲题的方法，如《雍里先生文集序》中归氏所论文章之道，即是以雍里先生文集之名《疣赘录》之“疣赘”二字而引申发挥；再如《草庭诗序》即以“草庭”入题，继而出入经子而论道，皆围绕“草庭”而阐发，最后复缴结于“草庭”二字，其它如《陟台图咏序》、《彩衣春燕图序》、《可斋记》、《耐斋记》、《元忠张君家传》等文，亦皆未能免去举业之旧习。归庄在《新刊震川先生集·凡例》中有云：“惟此书旧刻之误，不可胜举……昆山本则以从祖之好自用，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删去，篇中遂无照应，而擅改者尤多。”<sup>[11]</sup>此处所谓“篇首作文之由”者，皆与八股文原题、原起结构类似，故而有“往往删去”之事。科举之习影响于归有光古文创作之另一方面，即是文中对经史子集语言的引用，此一特征类似于宋人作诗时“掉书袋”之弊，如归氏《上徐阁老书》一文，先言“有光尝读《易》”，遂引用《易》中语言阐发道理，继而又言“又尝读史”，复又就史事阐发道理，最后复引曾巩“上范参政书”，纵观全文，不足 700 字而引用之处即已占去大半。观《震川先生集》，其中所作寿序、碑碣、墓志、圻志之文，究其人其事，往往与圣经贤传之语不相符，而归氏亦往往动辄引经据典，近于韩愈所言陈言者。究其原因，即在于明代中后期以后，士人所学几乎全在举业。就归有光而言，一生数十年所务者主要就是古文和举业，对于四书五经可以称得上是滚瓜烂熟，故而作文时对于经语、陈言信手拈来。

### 三、结语

通过对归有光为文宗尚与持论的分析，可以知道归氏学文于《史记》，而并非如王慎中、唐顺之一样以唐宋诸大家之文为宗尚。因此，笔者谓归有光不属于唐宋派，并非是立异之论。事实上，就归文特征而言，归有光亦不属于唐宋派之列。归有光古文的显著特征，其一即是善于记家庭琐事、言骨肉亲情，

而此一特征，正是其得于《史记·外戚传》。当然，琐事言情之作并非始于归有光，如韩愈、欧阳修皆有名作，然而韩、欧抒情之作并非是其最高成就和标志；对于归有光则不同，归文为今天所乐道者，主要即是其记家庭琐事、言骨肉亲情之文。其二则是举业之习对归有光古文创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应酬性文章之中。虽然唐宋古文创作方法对明代举业影响甚深，然而据此将归有光归入唐宋派则亦不符合情理，且举业之影响于古文创作，是一种被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既然归有光为文所学不与王、唐等唐宋派同趣，那么为什么后世会将其置于王、唐之列呢？事实上，这和归有光在古文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宋古文，说理、议论、叙事、抒情等，皆有所为人所称道者；而归文所善者，叙事则局限于家人琐事，抒情则专注于骨肉朋友。而明代中期以后古文所争论者，是以秦汉古文为法还是以唐宋古文为法，用今天的话说，明代古文是路线之争，归有光在古文路线之争中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其所走的是秦汉之路，而最终却走到了唐宋古文那里。是故，就归有光古文成就而言，显然并不像其自认为那样，或自比于迁、固，或欲与曾巩较高下，而是其在唐宋古文之路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当然，归有光最后走到唐宋古文之路上，并非说明其为文是以唐宋古文为宗尚，更不能将其归入唐宋派。袁宏道论明代古文作者，尝谓：“文词虽不甚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sup>[11]</sup>袁氏为文倡导性灵，故而能够跳出复古的束缚，所云“自辟户牖”者，则正是归有光折衷秦汉、唐宋二派所长而为己所用，亦是归氏能在唐宋古文中开辟一条小路之所在。

由是而言，对于归有光的古文，可以认为由秦汉入而由唐宋出。对于归有光同是以《史记》为法所作之《书张贞女死事》《项脊轩记》等文，其效果与成就之所以有如此不同者，林纾、钱穆等皆谓归氏善于记家庭琐事、言骨肉亲情之故，章太炎谓其专注于《史记》“闲情冷韵”<sup>[12]</sup>所致，实际上此皆是就其文章内容题材而论之。以笔者之见，如果从文法与文体的关系上考察，或许会有新的见解，归有光以古文自命，而八上春官皆不第，又加上骨肉凋零、故友多逝，其郁郁不平之气结之为情，常在未发已发之间，故其所为文章，迂回曲折，抒之为情则一唱三叹，似有言之不尽之哀；发为议论则喋喋不休絮絮叨叨，遂流为冗长拖沓之弊。然而，不管是归有光古文所长还是

所短,如果仅仅凭其古文成就而不顾其古文宗尚与特征,将归有光归入唐宋派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注释:

- ① 归有光所撰《文章指南》,专门讨论文章创作方法,然而其内容盖为自《古文关键》《文章正宗》《文章轨范》以来所言之为文之法,可谓陈陈相因、因袭而成书者,故本文不论。
- ② 此文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震川集》《明文海》中皆谓之《项脊轩志》,而《古文辞类纂》、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中则谓之《项脊轩记》,盖“记”“志”本通用。

参考文献:

- [1] 归有光. 震川先生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2] 王拯. 归方评点史记合笔 [M]. 成都:成都薛崇祠堂刻本, 1919.
- [3] 杨峰. 归有光研究 [D]. 上海:复旦大学, 2006.
- [4] 王夫之. 姜斋诗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169.

- [5] 张傅元,余梅年. 明归震川先生有光年谱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13.
- [6] 王拯. 龙壁山房文集 [G] //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203.
- [7] 吴小如. 古文精读举隅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329.
- [8] 徐树崢. 古文辞类纂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506.
- [9] 林纾评古文辞类纂 [M]. 慕容真,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247.
- [10] 黄宗羲. 黄梨洲文集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353.
- [11] 袁宏道. 袁宏道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96.
- [12] 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248.

## GUI You-guang's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Different from Tang and Song School: On Features of His Cre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ZHANG Rong-gu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18, China)

**Abstract:** Tang and Song School was the one of ancient Chinese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Jiajing. Its literary view was characterized by advocat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GUI You-guang was a master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Ming Dynasty. In terms of literary views, he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Qin and Han School.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GUI You-guang played a role of conn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from Tang and Song to Qing. That is, he inherited eight master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Tongcheng School of Qing Dynasty. For this reason, h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member of Tang and Song School. However, through analysis of GUI's advocacy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features of his creation, we can find that it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 to do so.

**Key words:** GUI You-guang; Tang and Song School; classical Chinese

(责任编辑:王建平)